



# 人力资本、家庭禀赋与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

## ——基于 CGSS2010 数据库资料分析

聂伟<sup>1</sup>, 王小璐<sup>2</sup>

(1.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2. 南京农业大学 农村发展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关系到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进程和路径选择。既有研究主要以农民工为分析对象, 对整个农民群体的城镇定居意愿仍然缺乏系统的经验性研究。基于 CGSS2010 农村模块的调查数据, 以传统“成本—效益”和新迁移经济理论为分析视角, 建立二元 logit 分析模型, 从个体人力资本和农民家庭禀赋角度考察了农民城镇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农民的总体城镇定居意愿并不强烈, 小城镇、县城(县级市)是农民城镇定居的首选层级。个体的人力资本越丰富, 越倾向于定居城镇。家庭非农人力资本越丰富, 城镇定居意愿可能性更高; 家庭总收入、家庭非农收入比例、家庭相对收入地位等家庭经济资本能显著提升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 但家庭经济资本中的家庭住房面积和家庭自然资本对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具有抑制作用。人力资本效应和家庭禀赋效应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呈显著差异, 因而需要因地制宜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关键词:**城镇定居意愿; 人力资本; 家庭禀赋; 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14)05-0053-9

## 一、背景与问题

农民向城镇迁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和城市化的必然结果。2013 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 53.73%, 东、中、西部的城镇化率差异显著, 呈阶梯性特征。总体上目前中国正处于“城市社会来临”背景下的发展新阶段, 进入到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关键时期, 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战略。在此背景下, 国内学者围绕新型城镇化的理论认知、<sup>[1]</sup>科学内涵、<sup>[2]</sup>发展道路和模式、<sup>[3]</sup>创新路径、<sup>[4]</sup>评价指标体系、<sup>[5]</sup>难题与挑战等<sup>[6]</sup>展开了全面细致的分析, 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作为新型城镇化的最终实施主体——农民, 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将关系到新型城镇化的速度、未来方向及发展质量。因此, 从自下而上的视角分析他们的城镇定居意愿现状, 研究城镇定居意愿的决定性因素

和内在机制, 对于因地制宜地确定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和提高城市化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并为国家制定相关人口迁移政策以及特色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提供理论参考。

##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 1. 农民城镇定居意愿的研究现状

农村城镇化是当前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议题, 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是农村城镇化的前提条件。过去一段时间, 很多学者就这一主题在安徽、浙江、重庆、四川、江苏、贵州、湖北等地开展了大量的社会调查, 这些调查大多采用“是否愿意到城镇(市)定居”或者“未来愿意长期住在哪里”等提问方式对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进行测量, 调查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一类调查发现为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比较高。如彭长生和周春芳分别基于

收稿日期: 2014-04-07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14-08-04

基金项目: 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13YJC840036); 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CXZZ13\_0014)

作者简介: 聂伟, 男,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研究方向为劳工研究、青年社会学。

王小璐, 女, 南京农业大学农村发展学院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为青年社会学、农村社会学。

2010年安徽和江苏的调查数据发现52.01%和58%的农民愿意到城镇定居。<sup>[7-8]</sup>卫龙宝在浙江的调查结果表明53.3%的农民愿意迁居到城镇<sup>[9]</sup>。成艾华和杜双燕分别对2013年湖北和2011年的贵州数据分析发现60.8%和55.5%的农民愿意迁移到城镇。<sup>[10-11]</sup>与上述结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类调查发现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较低。王友华等基于重庆和四川的调查分析,结果表明仅16%的农民计划到城镇定居。<sup>[12]</sup>王国辉等考察辽宁的数据发现,仅有13.4%的农民愿意长期在城镇定居。<sup>[13]</sup>上述的研究均是基于某一地区数据的研究结果,由于调查时间、地点、样本、指标等差异,导致研究结论不具有一般性和可比性。那么目前全国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究竟如何?迄今我们尚无可知。

在农民城镇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上,国内研究主要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展开分析。微观视角的研究从微观个体的人口特征出发,强调个体在特定社会制度安排下所处的社会结位置对农民城镇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者主要通过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确定个体的社会位置,研究发现上述变量对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产生显著的影响,男性、年轻的、未婚者、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民,其定居意愿强烈。<sup>[14-16]</sup>中观视角的研究主要从家庭、社会网络、社区等组织和网络角度分析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受到家庭经济、人口、住房结构等影响;家庭在子女数越多、家庭非农就业人数越多、家庭总体收入越高的农民城镇定居意愿越强。<sup>[9,14]</sup>家庭迁移模式影响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举家外出(或夫妇一起)的农民工其城镇定居意愿显著高于分离式迁移的家庭。<sup>[17-18]</sup>家庭的人均耕地面积与西部地区的农户迁移意愿呈显著负相关。<sup>[19]</sup>家庭住房两层以上的和家庭在城镇当中有房子有助于提升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sup>[7]</sup>社会网络中的“工具性关系”直接影响农民在城市的生存与发展境况,“情感性关系”有助于提高农民的归属感和城市适应,进而显著影响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sup>[12,20-21]</sup>社区居住地环境也是影响农民迁居的重要因素,山区居民比丘陵和平原地区的居民迁移意愿更显著。<sup>[22]</sup>宏观视角研究聚焦探讨以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为基础的社会体制和城乡收入结构因素,造成农民自身及子女生存发展机会的不均等,阻碍农民的城镇定居。实证研究发现城乡的二元教育政策、住房政策、劳动力市场政策等会显著抑制农民的城镇定居意

愿。<sup>[9]</sup>

综上所述,学术界有关农民城镇定居意愿研究已取得丰富成果,但研究仍然存在不足。就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现状而言,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某一单一地区的数据分析,研究对象聚焦于以农民工群体,而缺乏对全国农民群体的样本分析,遗憾未能对全国不同地区的农户意愿进行比较。就城镇定居意愿的测量而言,以往研究主要测量农民城镇定居意愿,而未对城镇定居计划进行深入的分析,城镇定居计划是意愿的更深层次推进,是定居行为发生的重要基础,因而通过计划来反映农民深层次的定居意愿会具有较好效果。就影响因素而言,已有研究虽然从不同视角分析了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但多从个体主义和中观的社会网络视角出发,家庭视角仍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虽有研究零星涉及家庭因素的相关变量,但鲜有研究将农民城镇定居意愿作为一项家庭决策进行研究,从新迁移经济理论角度出发全面系统考察家庭禀赋等变量对农民城镇定居意愿的影响。针对上述不足,在既定的宏观制度背景下,笔者尝试利用全国整体农民群体的样本,并结合微观层次个体人力资本和中观层次家庭禀赋等分析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

## 2. “成本—收益”与农民城镇定居意愿:理论与假说

“成本—效益”理论强调个体的迁移态度主要是基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考虑。舒尔茨(Schultz)等将迁移看作是迁移者的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对成本和收益作充分的考量,迁移只有在投资成本与收益相抵后有净得收益才做出。<sup>[23]</sup>托达罗(Todaro)认为城乡迁移取决于城镇的预期收入差距和城镇的就业概率,迁移的可感觉价值是迁移决策的最主要基础。<sup>[24]</sup>斯加斯塔德(Sjaastad)则将成本和收益更加细化,认为迁移成本不仅包含货币成本,如找工作所需要的开支、交通、食品成本等,迁居地的实际货币收益必须要大于成本;还包括非货币成本,如重新找工作的机会成本、适应新环境的心理成本;能够较好地融入新环境者,可能获取较好的生活体验等收益,迁移才可能产生;且非货币成本的净收益对迁居意愿影响更大。<sup>[25]</sup>社会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个体是有目的的行动者,个体行动是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之后追求最大功利的理性选择结果,<sup>[26]</sup>其中,理性可以分为生存理性、经济理性、社会理性等。最近的实证研究表明,农民工的城镇定居意愿是遵循上述三种理性原则,基于预期

收益最大化的考虑。<sup>[27]</sup>

基于上述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本研究认为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是基于自身人力资本的状况,对预期的所得和所失之间的考量和权衡,所呈现出的特定态度。一般认为,个体的人力资本存量越多,越可能在城市中获得较好的发展机会,预期净收益较高,城镇定居意愿可能会更强烈。具体而言,年龄越小者,其劳动能力和劳动素质越高,在城市中容易收获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并对城市生活认同度高,心理适应成本低,迁移意愿更高。教育程度对农民在城市的就业质量和生活质量具有正向影响,进而提高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有过非农经历是个体非农人力资本的一种重要体现,因此,有过非农经历者更可能适应城镇的就业需求;且对城市的生活有一定的了解,心理成本相对较低,城镇定居意愿可能更强烈。普通话水平越高,其在城市就业和生活的适应能力越强,越可能在城市拓展社会交往,认同城镇的生活方式,可能更倾向于迁移城镇。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1:农民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城镇定居意愿的可能性越高。

### 3. 新迁移经济理论与农民城镇定居意愿:理论与假设

与上述的传统理论假设所强调个人效用最大化不同,新迁移经济理论将分析单位从个人拓展到家庭;迁移决策不是独立的个体行为,而家庭或家户才是决策的基本单位。人口迁移决策不仅是基于整个家庭效益最大化的考量,并对家庭风险进行全面估算,努力使家庭风险最小化。<sup>[28]</sup>此外,该理论认为家庭作出迁居决策是基于相对收入地位的考虑,并提出具体的相对经济地位假说。家庭作为一个整体考虑迁居决策时,不仅考虑绝对收入的预期收入差距,而且还会将农村本地或参照人群(亲戚、朋友、邻居等)的收入水平纳入考虑范围,进行相对比较,产生一定的满足感和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越强烈者,更希望通过迁移改变现状,迁移的可能性越高。<sup>[29]</sup>新迁移经济理论对农村劳动力是否外出的决策具有较好的解释力,<sup>[30]</sup>但国内研究尚未系统考察新迁移经济理论对农民城镇定居意愿的影响。在中国农村,家庭禀赋特征对农民的行为选择具有重要的特殊意义,农民整体家庭观念强,成员互帮互助,共享劳动成果。在家庭内部,家庭成员根据家庭的共同资源禀赋决定家庭的生

活行动计划。家庭禀赋是指所有家庭成员或家庭所拥有的天然具有的以及后天获得的资源与能力,包括家庭经济资本、家庭人力资本、家庭自然资本、家庭社会资本等。它是个体禀赋的拓展,是所有家庭成员共享的资本,个体的行为意愿受到家庭禀赋因素的制约。<sup>[31]</sup>

家庭中长期从事非农就业的劳动力数量越多,非农人力资本越丰富,对农业的依赖程度较低,迁移城镇的直接成本和心理成本低,迁移意愿可能性更大,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假设2:农民的家庭人力资本越丰富,其城镇定居意愿的可能性更高。

农民从农村到城镇的迁移过程中,需要付出较大的迁移成本。家庭总收入越高者,其迁移的经济支付能力越强,越可能倾向于迁移到城镇。家庭非农收入的比例越高,表明家庭与农村的“脱嵌”程度越高,迁移城镇的适应能力越强,迁移城镇的可能性更高。根据相对收入地位假说,家庭相对经济地位越低者,相对剥夺感越强烈,到城镇定居的意愿更高。而家庭住房是农民家庭的重要固定资产,但难以实现同步迁移,将可能导致迁移意愿下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设:

假设3a:农民的家庭总收入水平越高,城镇定居意愿的可能性更高。

假设3b:农民家庭非农收入比例越大,城镇定居意愿的可能性更高。

假设3c:农民家庭相对家庭经济地位越高,城镇定居意愿的可能性更低。

假设3d:农民的现有家庭住房面积越大,城镇定居意愿的可能性更低。

迁移过程中家庭的自然资本难以实现同步转移,如家庭的耕地等,迁移将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些因素可能会制约农民的城镇定居行为。对此,我们提出第四个研究假设:

假设4:农民的家庭自然资本越丰富,其城镇定居意愿的可能性更低。

## 三、数据与测量

###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sup>①</sup>,采取多阶段和分层抽样设计在全

<sup>①</sup> 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主持实施的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在此表示感谢。



国范围内 31 个行政区进行抽样,共获得调查样本 11875 个,其中农村模板应答者为 5729 个,根据我们的研究需要以及部分变量存在缺失值,最终进入总体模型的样本为 4223 个。本研究采用 SPSS17.0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

2. 变量与测量

(1) 因变量

与以往研究不同,本研究通过询问被调查者“未来 5 年,您是否计划到城镇定居”测量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被访者从“是、否、已经在城镇定居”三个答案进行选择,由于研究主题为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因此数据处理时对已经在城镇定居的样本进行列删,最终选择回答“是和否”的样本进行分析,回归模型中以“否”为参照对象。

(2) 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为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狭义的人力资本主要指个体的教育水平;本研究引入广义的人力资本概念,将人力资本操作化为教育年限、年龄、非农经历和普通话水平。以“文化程度”来计算教育年限,计算标准为“没受过任何教育=0,小学或私塾=6,初中=9,高中(中专、技校、职高)=12,大专=15,本科=16,研究生及以上=19”。年龄采用直接测量法。非农工作经历询问被访者目前的工作状况,被访者从“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目前务农但曾经有过非农工作、目前务农且没有过非农工作、目前没有工作且只务过农、从未工作过”等进行回答,将前面两项合并为“有非农工作经历”,其他合并为“没有非农工作经历”,并

以“没有非农工作经历”作为参照。将被访者普通话水平根据“完全不能说、比较差、一般、比较好、很好”等级分别赋值为 1~5 分,得分越高代表普通话水平越高。

家庭禀赋主要包括家庭对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及自然资本、社会资本等的占有情况。囿于二手资料的限制,调查资料中没有家庭社会资本的相关测量,所以重点关注家庭人力资本、经济资本以及自然资本三个方面。家庭人力资本选择家庭长年(至少连续六个月)在外打工的劳动力数量来进行测量。家庭经济资本主要通过主客观两方面来进行测量,包含家庭年收入(2009)、家庭住房面积、家庭收入中非农收入比例、家庭的相对收入地位等进行测量。其中家庭年收入、家庭住房面积采用直接测量,家庭非农收入比例,通过家庭中的非农收入除以总收入所得。家庭的相对收入地位,询问被调查者“您家的家庭经济状况在当地属于哪一档”,分为“远低于平均水平”“低于平均水平”“平均水平”“高于平均水平”等四类,以远低于平均水平为参照。家庭自然资本主要是指农户拥有或可长期使用的土地,选用家庭承包的耕地面积测量家庭自然资本,采用直接测量法。

为了估计的准确性,研究中还纳入性别、婚姻状况、地域类型等作为控制变量。性别以女性为参照;婚姻状况分为未婚、已婚、离婚或丧偶,以未婚为参照组;根据现有的统计口径<sup>①</sup>,将地域类型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以西部为参照。

本研究所涉及的所有变量特征描述见表 1。

表 1 变量性质与描述统计

变量类型	名称	性质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城镇定居意愿	定类	0.113	0.317	0	1
控制变量	性别	定类	0.473	0.499	0	1
	地域类型	定类	1.773	0.775	1	3
	婚姻状况	定类	2.001	0.430	1	3
家庭人力资本	非农劳动力数量	定距	0.778	1.034	0	6
家庭经济资本	家庭年收入(万)	定距	5.490	13.053	0	600
	非农收入比例	定距	0.598	0.375	0	1
	家庭相对地位	定序	2.611	0.765	1	4
	住房面积	定距	103.02	201.00	4	7486
家庭自然资本	家庭耕地面积	定距	4.826	35.192	0	800
个体人力资本	年龄	定距	46.695	16.055	17	96
	教育年限	定距	10.409	4.371	0	19
	普通话能力水平	定距	3.446	1.148	1	5
	非农经历	定类	0.863	0.343	0	1

① <http://www.chinawater.net.cn/CWSNews/infor/0320.html>。

四、结果与分析

1. 农民的定居城镇意愿描述分析

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总现状如何?如果愿意定居到城镇定居,他们到城镇定居的目的是什么?愿意到什么层次的城镇定居?如果不愿意到城镇定居,其原因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根据表2可知,在城镇定居意愿现状上,愿意到城镇定居的比例仅为11.4%,88.6%的农民愿意继续留在农村,表明农民的总体城镇定居意愿并不强烈。在定居的动机上,58.73%农民希望在城镇定居生活,也有33.78%的农民为自己子女定居城镇做准备,由此可见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整个家庭所考虑的。没有计划的原因中,经济条件不允许占据主导地位,选择该项的比例达到77.09%。在定居层级偏好上,18.9%和39.4%的农民希望在小城镇和县城或县级市定居。与地级市、省城、直辖市相比,定居小城镇的经济成本相对较低,社会文化环境与农村较为接近,更容易成为多数农村居民的首要选择,据此可以认为推动小城镇的发展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

表2 城镇定居意愿相关情况的描述统计

城镇定居意愿	百分比
否	88.60
是	11.40
N	5009
定居地点	百分比
小城镇	18.90
县城/县级市	39.40
地级市	14.66
省城	12.72
直辖市	6.71
无所谓	7.60
N	566
定居目的	百分比
城镇生活	58.73
投资	3.07
为子女准备	33.78
其他	4.41
N	521
没有计划的原因	百分比
经济条件不允许	77.09
不愿到城镇定居	19.47
政策环境不允许	0.25
其他	3.18
N	4334

2. 农民城镇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1) 控制变量与农民城镇定居意愿

模型1的Pseudo R<sup>2</sup>系数为0.0441,表明性别、婚姻和地域特征能解释农民城镇定居意愿4.41%的方差。性别对城镇定居意愿的影响不显著。与未婚相比,已婚、丧偶或离异者的城镇定居意愿分别下降70.59%(1-exp(-1.224))、90.31%(1-exp(-2.334))。相较于已婚者而言,一方面,未婚者在城镇定居的总体生活成本低,对农村的依赖程度低;另一方面,未婚农民定居城镇可能增加与城镇居民的结婚可能性。与东部相比,中部、西部的农民城镇定居意愿分别下降47.69%(1-exp(-0.648))、25.84%(1-exp(-0.299)),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农民的城镇化意愿更强。与蒋乃华等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差异,<sup>[16]</sup>这可能是由于两者之间的样本差异所造成的。

(2) 人力资本与农民城镇定居意愿

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人力资本变量得到模型2,Pseudo R<sup>2</sup>系数从0.0441增加到0.1210,人力资本变量能够解释城镇意愿7.69%的方差。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年龄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0.0338),年龄每增加1岁,城镇定居意愿的可能性下降3.32%(1-exp(-0.0338))。教育年限与城镇定居意愿呈显著的正相关。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到城镇定居意愿的可能性增加9.53%(exp(0.0911)-1)。非农工作经历对城镇定居意愿的净回归系数显著为正(0.391),有非农工作经历者的城镇定居意愿是没有非农经历者的1.47倍(exp(0.391)=1.47)。普通话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0.148),普通话水平每增加1个等级,到城镇定居意愿的可能性增加15.9%(exp(0.148)-1)。

数据分析表明,人力资本变量的相关假设均得到验证。也就是说个体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年龄越小者、教育水平越高者、有过非农工作经历者、语言能力水平越高者,其在城镇获取非农就业的机会越容易,就业层次可能更高,就业收入水平越高,城镇定居的预期经济收益较高;并且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者,越能在城市中拓展社会交往网络,提高城镇生活适应性和归属感,定居城镇的心理成本低。可见,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是基于个体的成本—收益的考虑,个体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者,定居城镇的预期净收益较高,城镇定居意愿更强烈。

表 3 影响农民城镇定居意愿的 Binary logistic 回归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控制变量			
男性(女性=0)	0.126(0.0913)	0.0781(0.0992)	0.158(0.112)
已婚(未婚=0)	-1.224*** (0.134)	-0.197(0.161)	-0.189(0.192)
丧偶或离异(未婚=0)	-2.334*** (0.278)	-0.417(0.317)	-0.202(0.359)
中部(东部=0)	-0.648*** (0.109)	-0.552*** (0.114)	-0.583*** (0.131)
西部(东部=0)	-0.299*** (0.113)	-0.0544(0.123)	-0.0497(0.137)
人力资本			
年龄		-0.0338*** (0.00451)	-0.0363*** (0.00509)
教育年限		0.0911*** (0.0166)	0.0848*** (0.0187)
语言能力		0.148*** (0.0491)	0.0947* (0.0551)
非农工作经历(没有=0)		0.391*** (0.107)	0.254** (0.129)
家庭禀赋			
家庭人力资本			
家庭非农劳动力数量			0.175*** (0.0499)
家庭经济资本			
家庭总收入			0.0868*** (0.0182)
家庭非农收入比例			0.281* (0.170)
家庭相对收入地位(远低于平均水平=0)			
低于平均水平			0.511* (0.274)
平均水平			0.709*** (0.270)
高于平均水平			0.997*** (0.316)
住房面积			-0.00280*** (0.000747)
家庭自然资本			
家庭耕种的田地面积			-0.000348(0.00233)
常数	-0.591*** (0.149)	-1.497*** (0.310)	-2.000*** (0.438)
N	4976	4965	4223
Pseudo R <sup>2</sup>	0.0441	0.1210	0.1500
LR chi <sup>2</sup>	156.3***	428.2***	449.8***
-2ll	-1695	-1556	-1275

注:1:括号外为非标准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2:\*\*\**P*<0.01,\*\**P*<0.05,\**P*<0.1。

(3)家庭禀赋与农民城镇定居意愿

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引入家庭禀赋相关变量得到模型 3,Pseudo R<sup>2</sup> 系数从 0.1210 增加到 0.1500。模型解释力增加 2.9%。具体来看,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农民家庭长期从事非农工作劳动力数量的回归系数为 0.175,农民家庭中的非农劳动力数量每增加 1 人,其城镇定居意愿增加 19.12%(exp(0.175)-1),假设 2 得到证实。家庭中长期外出打工的劳动力越多,家庭成员接触城镇的机会越多,对城镇的心理适应程度较高。家庭的非农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家庭成员能够在城镇中获取较好的非农发展机会,工作的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低,面临无业或失业的风险小,整个家庭能够在经济上较好地适应城镇生活,更倾向于定居城镇。家庭总收入每增加 1 万元,农民到城镇的定居意愿增加 9.06%(exp(0.0868)-1),假设 3a 得到验证,家庭非农收入比例越高,农民定居城镇的意愿更高;家庭的非农收入比例每增加一个单位,个体定居城镇的意愿增加 32.44%(exp(0.281)-

1),假设 3 被证实。此结果验证了前文描述性分析,家庭的经济收入和收入结构是制约农民城镇定居的重要因素。家庭总经济收入越高者,在迁移之初,能够承担较高的迁移成本;在迁移之后,能够支付较高的城镇生活成本。家庭非农收入比例越大,家庭对农业的依赖程度低,可以较快速地融入城镇生活,降低家庭城镇生活的经济风险。家庭相对收入地位也是影响个体定居城镇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回归系数显示,农民家庭的相对收入地位越高,定居城镇的意愿可能性更大,与假设 3c 的呈现相反的结果,与上文所述的相对地位收入假说存在较大的差异。一个合理的解释在于,家庭相对收入地位越高,生活预期、生活信心相对较高,迁居城镇的可能性更大;与本地农村居民相比,家庭相对收入地位较低者的相对剥夺感强烈;若从农村向城镇迁移定居,参照对象将是绝对收入水平更高的城镇居民,那么他们将可能产生比以往更强烈的相对剥夺感,降低生活幸福感,因而可能更不愿意定居城镇。

家庭经济资本中的家庭住房面积和家庭自然资本均与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呈负相关关系,家庭住房面积变量对城镇定居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家庭住房面积每增加 1 平方米,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下降 0.27% ( $1-\exp(-0.00280)$ ),假设 3d 得到证实。家庭中耕种的田地面积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与城镇定居意愿呈负相关,表明样本中家庭的田地面积越大,城镇定居意愿越弱;假设 4 未得到验证。家庭住房是农民家庭中重要的固定资产,家庭耕地是农民的重要生活保障,但均在农民从农村向城镇迁移的过程中难以实现同步转移,制约农民的城镇定居计划。农村房地产市场发展滞后,原有住房难以实现同步出售或出租,导致进城购买或新建住房的资金缺乏,因此家庭住房面积越大者,城镇定居的住房机会成本高。家庭耕种的田地面积数量越多,农民的农业收入水平可能更高,定居城镇将可能导致预期收入水平下降,降低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

3. 不同地域类型的农民城镇定居意愿影响因素比较分析

上述模型 1 的结果表明不同地域类型的农民城镇定居意愿具有显著的差异,那么影响不同地域

类型的农民城镇定居意愿的因素是否一致?从表 4 的各模型的解释力来看,三个模型的解释力具有显著差异,东部的模型解释力最大,Pseudo R<sup>2</sup> 为 20.16%,西部模型的解释力最小,Pseudo R<sup>2</sup> 为 12.34%,说明不同地域类型的农民定居城镇意愿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

综合模型 4、模型 5、模型 6 结果可知,人力资本变量在不同地区呈现不同的效应。年龄在东、中、西模型中均呈现显著的负效应。普通话水平只对东部地区的农民城镇定居意愿有显著影响。与中西部相比,东部城镇地区中流动人口异质性强,更多采用普通话进行言语交流;普通话能力水平越高者,在城镇中越可能获取较好的就业机会和人际交往面越广,城镇定居意愿更强烈。教育与东、中部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呈显著的正相关;而对西部的农民城镇定居意愿不具有显著统计性。非农经历只在西部模型中通过显著性检验。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落后于中西部,城镇中非农就业工作机会少,所以那些教育水平高者也可能难以在城镇中获得稳定的非农工作,导致城镇定居意愿不强烈;而在总体非农比例较低的西部,有过非农经历者可能对城镇环境的适应性更高,更倾向于定居城镇。

表 4 不同地域类型农民城镇定居意愿的 Binary logistic 回归结果

	模型 4:东部	模型 5:中部	模型 6:西部
男性(女性=0)	0.146(0.204)	0.161(0.192)	0.0794(0.199)
已婚(未婚=0)	0.0493(0.359)	-0.276(0.328)	-0.157(0.338)
丧偶或离异(未婚=0)	0.456(0.694)	-0.163(0.574)	-0.656(0.646)
年龄	-0.0458*** (0.009)	-0.0341*** (0.008)	-0.0308*** (0.008)
语言能力	0.246** (0.105)	-0.0378(0.0895)	0.167 (0.101)
教育年限	0.0957*** (0.0349)	0.122*** (0.0334)	0.0424(0.0308)
非农经历	-0.0218(0.261)	0.206(0.212)	0.444** (0.215)
家庭非农劳动力数量	0.299*** (0.0905)	0.135(0.0840)	0.0501(0.0945)
家庭总收入	0.121*** (0.0317)	0.0920** (0.0381)	0.0467(0.0316)
家庭非农收入比例	0.0109(0.306)	0.644** (0.311)	0.375 (0.298)
家庭相对收入地位=(远低于平均水平=0)			
低于平均水平	-0.140(0.448)	1.432* (0.739)	0.580(0.427)
平均水平	0.105(0.436)	1.582** (0.734)	0.819*(0.420)
高于平均水平	0.558(0.516)	1.895** (0.786)	1.012*(0.530)
家庭住房面积	-0.00345** (0.001)	-0.00458*** (0.001)	-0.000902(0.001)
家庭耕种田地面积	0.00160(0.00463)	-0.00400(0.00506)	-0.0265*** (0.009)
常数	-1.581** (0.772)	-3.299*** (0.942)	-2.552*** (0.667)
N	987	1914	1322
Pseudo R <sup>2</sup>	0.2016	0.1308	0.1234
LR chi <sup>2</sup>	180.92***	142.71***	118.87***
-2ll	-358.2	-474.0	-422.4

注:1. 括号外为非标准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2. \*\*\*P<0.01, \*\*P<0.05, \*P<0.1。

家庭禀赋相关变量对不同地区农民城镇定居意愿的影响亦存在不一致性。家庭非农劳动力数量与东部地区的农民城镇定居意愿呈显著正相关;

家庭总收入对西部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影响不显著;家庭非农收入比例只对中部地区的农民城镇定居意愿产生显著的影响。家庭相对收入地位变量



在东部模型中不显著。家庭住房面积对东、中部的农民城镇定居意愿影响显著。家庭耕种的耕地面积只与西部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呈显著的负相关。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原因可能在于各地区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差异所致。在东部地区,城镇工业化水平较高,诸多农民选择到附近的乡镇企业或其他部门就业,基本实现就业和生活方式的城镇化,总体非农收入比例较高。农民城乡意识淡薄,与农业的紧密度低,对城镇生活的预期不高,这造成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与家庭非农收入比例、家庭耕种田地面积、家庭相对收入地位不具有显著相关性;但家庭的经济总支付能力和家庭住房面积仍然是决定城镇定居的重要因素。在城乡二元结构凸显的中部地区,城镇生活对农民有较大的吸引力。那些与农村“脱嵌”程度越高的农民,家庭经济支付能力越高,家庭生活相对收入地位越高的家庭,对城镇生活的适应度可能更高,城市生活预期更高,更倾向于定居城镇。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城镇发展水平和工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接纳能力有限,发展空间较小,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够完善。因而农民的城镇生活预期偏低,导致那些家庭收入水平高、家庭非农人力资本丰富、家庭非农收入水平越高、家庭住房面积越小的群体城镇定居意愿同样没那么强烈。西部地区的农业机械化程度低,若定居城镇可能导致耕地和种植等不方便,必然增加耕种的直接成本,耕种田地面积越多者的整体预期收益将下降,迁居城镇的意愿可能性显著下降。

##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利用 CGSS2010 的数据考察了农民城镇定居意愿的现状,并分析人力资本、家庭禀赋等因素对城镇定居意愿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几点结论:第一,农民定居城镇的意愿总体并不强烈,只有 11.4% 的农民真正愿意到城镇定居;定居层级上,小城镇、县城或县级市是大部分农民的首选地。第二,农民人力资本越丰富,城镇定居意愿的可能性更高;农民家庭非农人力资本存量越高,定居城镇的意愿越强烈;家庭总收入、家庭非农收入比例、家庭相对收入地位等家庭经济资本对农民的城镇定居具有显著的推力作用;但家庭经济资本中的家庭住房和家庭自然资本对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呈负向影响。第三,不同地域类型的农民城镇定居意

愿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别。在东部地区,教育、语言能力、家庭总收入水平、家庭非农劳动力数量、住房面积是影响农民城镇定居意愿的显著因素。中部地区,年龄越小者,教育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定居城镇的意愿更强烈;家庭经济资本对农民城镇定居意愿影响显著。西部地区,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主要受到个体非农工作经历和家庭自然资本的影响。

农民从农村迁移到城镇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绝不是单一的理论或视角能够完全解释的,需要多层次多角度综合考虑。通过上文的分析表明,农民的城镇定居决策不仅基于个体人力资本的效用最大化考虑,而且也是基于整个家庭利益的最大化考虑。前者再次验证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理性假设,个体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参与城镇劳动力市场竞争能力更强。更容易适应和认同城镇的生活方式,更好更快地融入城镇生活;基于生存理性、经济理性、社会理性等选择,迁移意愿相对较强。后者验证了新迁移经济理论在中国农民城镇定居决策方面适用性,整体上是适用的。以往的新迁移经济理论只强调迁移受到家庭效益最大化目标的影响,并且更多运用在农民是否外出务工或回流的决策上,未能全面考察家庭禀赋因素对于农民城镇永久迁移意愿的内在影响机制,本研究深化这一主题的研究,认为农民的迁移决策基于以家庭禀赋为基础的家庭效益最大化的考虑。家庭禀赋对农民的城镇定居主要体现了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家庭非农人力资本能够为农民快速融入城镇生活提供较好的人力支持。最后,家庭总收入、非农收入比例等经济资本直接关系到农民城镇定居的直接支付能力以及城镇生活的适应能力,为农民定居城镇提供直接稳定的物质支持。家庭难以同步转移的住房资本和自然资本对农民城镇定居具有阻碍作用。

人力资本效应和家庭禀赋效应在不同地区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充分尊重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并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结合。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城镇工业化水平高,大部分农民实现就业和生活方式城镇化;应全面提高农民的总收入水平,提升农民的语言沟通能力,完善当地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民的就地城镇化。在经济发展中等的中部地区,加强对农民非农工作技能的培训,帮助农民顺利实现非农就业,扩大农民家庭总收入和非农收入比例。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应该努力提升城



镇的经济发展水平,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增强城镇的就业吸纳能力;完善城镇公共服务建设,营造良好的城镇外部环境,增加城镇生活的吸引力,提升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囿于二手资料的限制,本研究未能将家庭社会资本等概念纳入分析框架,这是本研究的研究局限,需要日后新的数据作进一步的研究检验。

致谢:本文初稿曾在2014年中国社会学年会—青年博士论坛宣读,得到成伯清、周晓虹等的评议和指正,匿名审稿人以及导师风笑天等对文章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与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文责自负。

## 参考文献:

- [1] 张鸿雁. 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创新[J]. 社会学研究,2013(3):1-14.
- [2] 李国平. 质量优先、规模适度:新型城镇化的内涵[J]. 探索与争鸣,2013(11):19-21.
- [3] 周冲,吴玲. 城乡统筹背景下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新型城镇化路径研究[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1):200-202.
- [4] 李华燊,付强. 新型农村社区:城镇化道路的新探索[J]. 中国行政管理,2013(7):120-122.
- [5] 王博宇,谢奉军,黄新建. 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以江西为例[J]. 江西社会科学,2013(8).
- [6] 陈伯庚,陈承明. 新型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疑难问题探析[J]. 社会科学,2013(9):34-43.
- [7] 彭长生.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迁居选择行为研究——基于多元 logistic 模型的实证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2013(3):15-25.
- [8] 周春芳. 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迁居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以苏南地区为例[J]. 调研世界,2012(8):33-37.
- [9] 卫龙宝,储德平,伍俊骞. 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经济发达地区农民的迁移意愿分析——基于浙江省的实证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2014(1):91-98.
- [10] 成艾华,田嘉莉. 农民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133-137.
- [11] 杜双燕. 基于农民选择意愿下的贵州人口城镇化研究[J]. 贵州社会科学,2013(9):139-142.
- [12] 王友华,吴玉峰,郑美雁. 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居民城镇定居意愿研究——基于成渝统筹城乡配套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实地调查[J]. 经济体制改革,2013(3).
- [13] 王国辉,潘爱民. 阜新市农村居民城镇定居意愿研究——基于阜新市彰武县的调查分析[J].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345-348.
- [14] 黄振华,万丹. 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及其特征分析——基于全国30个省267个村4980位农民的调查[J]. 经济学家,2013(11).
- [15] 何雄,陈攀. 农村女性迁居城镇意愿状态的实证分析——以鄂州“黄石”仙桃三地为例[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1):97-102.
- [16] 蒋乃华,封进. 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意愿考察——对江苏的实证分析[J]. 管理世界,2002(2):24-28.
- [17] 李强,龙文进. 农民工留城与返乡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12(2):46-54.
- [18] 叶鹏飞. 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研究:基于七省(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社会,2011(2):153-169.
- [19] 吴秀敏,林坚,刘万利. 城市化进程中西部地区农户的迁移意愿分析——对成都市农户的实证研究[J]. 中国农村经济,2005(4):27-33.
- [20] 王毅杰. 流动农民留城定居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 江苏社会科学,2005(5):26-32.
- [21] 刘茜. 留下还是离开: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J]. 社会,2013(4):103-116.
- [22] 李君,李小健. 不同区域环境条件下农户居住偏好的实证分析——基于河南省346户的农户调查[J]. 河南科学,2008(7):868-873.
- [23] 舒尔茨. 人力资本投资[M]. 吴珠华,等,译.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 [24] Todaro M P.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9(3):138-148.
- [25] Sjaastad L A. The Costs and Returns of Human Migra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62(5):80-93.
- [26] Coleman J S.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M].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27] 熊波,石人炳. 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以理性选择理论为视角[J]. 人口与发展,2009(2):20-26.
- [28] Stark O, Bloom D. 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5(75):173-178.
- [29] Stark O, Yitzhaki S. Labour Migration as a Response to Relative Deprivation[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1988,(1):57-70.
- [30] 杨云彦,石智雷. 家庭禀赋对农民外出务工行为的影响[J]. 中国人口科学,2008(5):66-72.
- [31] 石智雷,杨云彦. 家庭禀赋、家庭决策与农村迁移劳动力回流[J]. 社会学研究,2012(3):157-181.

(责任编辑:李良木)  
(英文摘要下转第119页)